



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在鲁艺窑洞前空地上对全体师生做重要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时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指的其实就是以延安鲁艺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大军。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央视推出了大型纪录片《大鲁艺》。百名高龄老艺术家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讲述了当年的理想热情和青春过往，一个个精彩纷呈的个体故事构成了一部鲜活的集体记忆，而我们也循着老人们的笑声与泪水，重温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延安鲁艺的那些人那些事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延安鲁艺的大礼堂

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文艺殿堂

抗战爆发后，陕北小城延安成为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大批沦陷区和大后方的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奔赴延安。据延安史学者朱鸿召介绍：“抗战前国民政府所属大专以上学历在校学生人数大概有5万多，经历大迁徙后，实际复校的只有近3万人，流失掉的近2万人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到延安去了。”

1937年秋，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来到延安，这是来自大都市的第一个文艺团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见并宴请了第五队的全体成员。席间毛泽东非常高兴，对大家说：“欢迎你们这些艺术家来延安！”随后又说要办个学校，培养无产阶级艺术人才。关于当时的情景，演剧队编剧莫耶在《延安鲁艺生活散记》中回忆：“这时主席放下筷子，想了一想，把大手有力地一挥，说：‘我看就叫鲁迅艺术学院吧。’”

随后一段时间，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蚁社流动宣传队一分队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宣传队也陆续到达了延安，与当地的文艺爱好者一起，创作演出了《广州暴动》、《血祭上海》等宣传革命的大型话剧。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评论：“这次公演推动了延安艺术界新阵地的建立，也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

1938年春，中央决定以参加《广州暴动》、《血祭上海》创作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和演出团体为基础组建鲁迅艺术学院。留苏出身的戏剧家沙可夫主持起草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这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出了鲁艺创立的初衷：“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不容稍缓的工作。”

鲁艺成立后，院长暂时空缺，沙可夫以副院长身份主持工作。1939年夏，沙可夫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办华北联合大学，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

由于缺乏师资力量，鲁艺创办之初只设立了戏剧系、音乐系和美术系，学制为六个月。后来又增设了文学系，并更名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这时鲁艺的办学条件已大为改观，学校迁至延安城郊一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内，一些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文艺名家也先后到鲁艺任教，生源开始以文艺新秀为主，并先后创作了大量讴歌光明鞭挞黑暗的文艺作品——此时的鲁艺已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文艺殿堂。

延河之滨的“文艺范儿”

延安鲁艺汇集了延安半数以上的文艺家和大批才华横溢的文艺青年，成为延安文艺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的万力当时正在鲁艺文学系就读，他笔下的鲁艺生活令人神往：

“在学校大门口，挂着一块长条的大木牌子，上边写着‘鲁迅艺术学院’几个黑色大字。这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大门里面，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容纳五六百人的教堂。……教堂里面有一个台子，是过去神父带领信徒作祈祷的地方，现在成了我们演出中外名剧的舞台。在这里我曾看到学校的实验剧团和戏剧系师生演出的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婚事》（独幕剧）；契诃夫的《白茶》、《蠢货》、《求婚》三个独幕剧；苏联的《带枪的人》和《海滨渔歌》（独幕剧）等世界名剧；曹禺的名剧《日出》也在这里演出过多次。我还看过本校师生创作的一些多幕剧和独幕剧。”

鲁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的精神却是富足的。当

时鲁艺的老师周扬、何其芳、陈荒煤、冼星海等，大都在大城市受过很好的生活历练与文化熏陶，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有的还留学国外多年，他们把外面的世界带到陕北的窑洞里。就在这些土得掉渣的窑洞中，鲁艺师生们办起了韵味十足的“文艺沙龙”，曾担任文学系主任的诗人萧三用俄语朗诵普希金的长诗，而何其芳“总是用很重的川东腔朗读，声情交融，自然亲切，没有一点花架子”。据鲁艺学员冯牧回忆，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围坐在何其芳老师身边，听他在油灯旁用柔和的声调朗诵他的新作《夜歌》：“你呵，你又从梦中醒来，又将睁着眼睛到天亮，又将想起你过去的日子，滴几点眼泪到枕头上。”多年以后，冯牧仍然记得那夜的情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打动了。我感到，这首诗如同一只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拨动和抚摩着我的心脏。”

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浪漫和爱情，当时在鲁艺教书的周立波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天上的星星，地下的眼睛。比起天上的星星，我更爱地上的眼睛。”很明显这是一首情诗，同学们都很纳闷，这位年轻老师“地上的眼睛”究竟是谁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周立波爱上了文学系第二期的女生林蓝，延河边迷人的月色中，经常看见这对师生甜蜜的身影。

文学系的苏菲是鲁艺的校花，她与美国医生马海德恋爱了，每当周末的傍晚，马海德都会骑一匹马来接她约会。鲁艺的男生看到自己的校花被“外人”摘走，特别生气，一见马海德来鲁艺便对他大喊：“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说完便一拥而上翻走老马口袋里所有的香烟和零钱。面对这帮剪径的“刀客”，马海德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苦笑。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

1942年5月初，针对当时边区文艺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召集边区文化界人士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冼星海一家摄于「鲁艺」窑洞前

4月底，毛泽东便与凯丰（中宣部代理部长）、周扬、李伯钊（鲁艺编审委员会主任）一起拟定了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名单。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中央领导、思想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有资料表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家共有97人，而其中鲁艺就有30人左右——鲁艺在延安文化界的地位和分量，由此可略见一斑。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他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毛主席又亲自到鲁艺讲演，据贺敬之回忆：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到毛主席。我就坐在第一排，离得非常近。主席穿着旧军装，打着补丁。就是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大鲁艺’、‘小鲁艺’的命题。毛主席说，你们这个鲁艺还是小鲁艺，还有个鲁艺，那就是广大的社会、广大的群众，你们要到人民中间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以非常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人民艺术家与人民、与社会的关系。这跟《讲话》的精神完全一致。”

随后，鲁艺人走出了象牙塔，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从民间文艺、陕北民歌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歌曲《南泥湾》和歌剧《白毛女》等优秀作品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完成的。

1949年后，当年的鲁艺师生从陕北窑洞走向了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栋梁，我们从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盛况：周扬、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周立波、贺绿汀、沙可夫、华君武、公木、冯牧、穆青、贺敬之……

名单很长，我想，与其写在纸上，不如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